

举世谤议下的反思

——论郭嵩焘的群议观

颜 志

(浙江大学 历史系, 浙江 杭州 310028)

[摘要]在举世谤议下,郭嵩焘对士大夫的群议行为展开反思。他认为在群议中,正确的少数人受到错误的多数人的攻击,群议成为压迫性力量,四种原因导致群议恶风的产生。郭氏的群议观与其言语观有密切关系。他认为君主应制止群议,大臣不应卷入群议,言官当废。郭氏带着对群议的思考去考察西方政治制度,认为君德、两党制是英国政论风气良好的原因,多党制导致法国政坛议论纷繁。

[关键词]郭嵩焘;群议;语言暴力;议会制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17X(2017)05-0104-07

Reflection Under Public Criticism: On Guo Songtao's View of Public Opinion

YAN Zhi

(Department of History,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8, China)

Abstract: Under the public criticism, Guo songtao reflected on the public opinion of scholar - bureaucrat. He thought that in the public opinion the majority with wrong idea attacked the minority with the right opinion. Public opinion was a kind of power to oppress people with different ideas. Four causes led to public opinion. Guo's view of public opinion was closely related with his view of speech. Guo thought that the majesty should restrain public opinion, the chancellors should not get involved in public opinion, and the censure officials should be abolished. Guo cognized the west with the awareness of public opinion of Qing dynasty. He thought the character of king and the two - party - system generated good general mood of political discussion in England, while multiparty system generated bad general mood in France.

Key words: Guo Songtao; public opinion; language violence; parliamentarism

郭嵩焘(1818—1891),字伯琛,号筠仙,又号玉池老人。他于咸丰朝入值南书房,后参与筹办天津海防,奉旨查办山东诸海口厘税;同治朝被任命为广东巡抚,在职期间大力办理厘捐,丰裕税收,支撑军饷;光绪初年,入值总理衙门,奉命出使泰西,成为中国首任驻外大使。

郭嵩焘在洋务、厘捐等问题上的认识,与主流舆论相距太远,因此饱受群议之苦。目前,学界对

士大夫批评郭嵩焘的言论,给予了较多的描述,但对郭氏关于士大夫议论的思考,则着力不多。王兴国认为郭氏因为饱受诟病,所以随着对西方认识的加深,对士大夫的虚骄之气,展开了“不遗余力的攻击”^[1]。钟叔河认为,郭氏已经意识到中英政坛议论风格反差巨大的原因。郭认为“这是政治制度的问题,而不是政治人物个人品质的问题”,进而“否定了‘中国秦汉以来二千余年’的封建专制政

体”。^{[2]129}汪荣祖指出,郭氏“不能忘怀《申报》曾报导谣言,对他中伤并加以嘲笑”^{[3]279}。总的来说,对郭嵩焘关于群议的反思,学界虽有触及,但过于简略,未作深入考察。本文以郭嵩焘的群议观念为研究对象,分析郭氏对群议特点的认识、对恶劣群议风气成因的思考,考察郭氏的群议观与言语观之间的关系,论述郭氏对君臣面对群议当如何作为的思考,讨论对群议的思考在郭氏认识西方政体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一 群议的特点

郭嵩焘的群议观,来自对当时士大夫群议的观察与反思。郭嵩焘信奉班固的外交名言,“制御夷彝之道,当使曲在彼”^{[4]218},主张和夷政策,因此受到当时士人们的群攻。“咸丰九年办理天津洋务,京师议论螳沸,初闻吾言,群相怪愕。”^{[5]14}“京师间以此说语诸朋好,多相抵牾。”^{[4]407}郭氏向士大夫们介绍洋情,却招来横议。“能知洋情,而后知所以控制之法,不知洋情,所向皆荆棘也。吾每见士大夫,即倾情告之,而遂以是大招物议。”^{[6]11}

郭氏对群议的思考,实际上是对士大夫群议举动的思想回应。根据郭氏的日记,以及他晚年的自叙,可以大致确定郭氏对群议的思考开始于当值南书房时期。当他得知大沽失守、北京陷落的消息后,他对群议的批判与思考进入了一个高峰,此时他的日记中突然出现了大量的对士大夫群议的评述,此后他对群议的批判与认识不断深入。

从郭嵩焘对朝中士大夫群议主战的批评,以及其它相关表述中,可以知晓在郭氏心中,群议有如下两个特点:第一,在群议中,坚持正确意见的人占少数,多数人坚持的意见是错误的。第二,群议具有压迫性。在群议中,言论由被人言说的宾词变成具有独立性、压迫性的主词。

在郭嵩焘批评群议的文字中,多处体现了群议中正确的少数与错误的多数的对立。在他评论谭廷襄的文字中,这种少数与多数的对立体现得特别明显。“予谓夷船初至,京师万口颂谭制军,而予独为忧虑。其后万口诋之,而予独为申辩。”^{[4]218}在万口称颂面前,少数人独为忧虑,与万口咒骂相对,少数人独为申辩。郭氏借南宋名臣罗点的语句,来表达少数人在此种局面下的愤懑与无奈。“众皆默,己独言,则曰沽名;众皆浊,己独清,则曰立异。”^{[4]490}

与少数人相对的,是遍布京师、执迷不悟的多数,“观竹汀之言,举京师之议论狂惑迷乱,亦略可知矣。”^{[4]396}他们千百成群,高谈阔论。“在廷士大夫哆口言战,千百为群。”^{[4]402}他们人多势众,互相鼓动,使朝廷进退维谷。“流俗之见之所争持,顺之而政体失,违之而人言益嚣,语言所不能禁,文告所不能施。”^{[4]474}虽然这些人数量众多,但是他们的观点却大错特错,因此郭氏非常赞同《墨经》中不以人数多寡来论是非的观点。“读《墨子》经上、经下及经说四篇,奥涩不可句读,亦时有讹误,而其文义亦有耐人寻味。……曰:‘诽之可否,不以众寡。说在可非。’”^{[7]219-220}

在人千人万的主战者与寥寥无几的主和者的对立中,前者给后者施加了极大的压力。在这种压力下,清醒的少数人,只能缄口不言,顺着多数人的意思,指鹿为马,否则,他们便成为众矢之的,受千夫所指。“刘敬、季布、董仲舒之言,宋元以后无敢道者。即郭汾阳单骑见回纥,富郑公使金议岁币,使在今日行之,徒供群口之詈詈而已。”^{[4]402}这种压迫,郭嵩焘在北京时有过切身体会。一次他去陈孚恩家做客,在那里他遇到几位正在放言高论的主战派士大夫,郭嵩焘自然不能同意他们的这种观点,于是将自己的观点发表了一番,“洋务一办便了,必与言战,终无了期”。客散后,陈孚恩劝其以后不要公开发表主和言论。“适言洋务不战易了,一战便不能了,其能至有理,我能会其意。然不可公言之,以招人指摘。”^{[5]15}

面对士大夫的群议,哪怕是位高权重如奕訢,只要他不与主流话语保持一致,同样会受到众人的指指点点。郭嵩焘在欧洲时与威妥玛曾谈到这个问题。郭嵩焘认为“恭王能谳悉一切情形,而苦不能任事”,其原因是“直苦人言龙〔厖〕杂,不敢任耳”。威妥玛进一步补充,“动辄怕说是汉奸”^{[6]436}。总理衙门也是一样。在群议面前,总理衙门不得不小心谨慎,唯恐招来非议。“朝廷设立总理衙门专办洋务,亦不能不内惜人言,周章顾盼,无敢直截办理。”^{[8]359}甚至连皇帝也会成为群议攻击的目标,郭氏曾举南宋为例来说明这一点:“南宋不然,人持一疏、夹一策以争和议,不揣国势,不察敌情,言之痛切,而无当于机宜。人主与大臣主和议者,动为众矢之所集。”^{[4]431}

在这种情况下,少数者虽然没有受到外在暴力的威胁,但是他们却受到了实实在在的精神压迫。

这压迫的来源不是别的,正是士大夫们的群议,所谓人言可畏。人作为言论者被言论压制,人与言论的关系发生倒转。本来人是主词,言论作为人的行为结果是宾词,但在群议中,言论脱离人,获得了独立性,成为具有压迫性的主词。

在郭嵩焘的不少词句里,言论、议论不以被动的形式出现,而以主动形式出现,人作为言语的创造者,却居于被动状态。在群议面前,彭雪琴处于被动状态。“贤如雪帅,亦为此种议论所蔽惑,无暇达观昭旷之外。”^{[9]225}李鸿章在群议面前也处于被动状态,也被士大夫的群议所挟持。“今时独合淝伯相能知洋务,而以位高望重,不敢与枢府异同,遂为议论所持。”^{[9]224}咸丰九年,郭嵩焘在日记中感叹,办理洋务二十年,封疆大吏们总是受制于群议。“疆吏失抚绥之宜,诬诈无礼,以为所劫持,二十年如出一辙。”^{[4]402}郭嵩焘甚至觉得国家机器也没能摆脱士大夫群议的压迫。“朝廷为议论所持,旁皇迷乱,莫知所措。”^{[4]402}朝廷之所以做出派僧格林沁驻扎天津的决定,实是迫于群议的压力。“僧邸驻防天津迫于群议,非上意。”^[10]于是在郭嵩焘看来,北京之所以被英法联军占领,咸丰帝之所以出逃热河,都是群议惹的祸。“夷人之变,为旷古所未有。其祸成于僧邸,而实士大夫议论迫之然也。”^{[4]403}

至此,群议误国的观点就自然而然地出现了。在郭嵩焘的心中,士大夫们的群议有害国家,甚至能使国家灭亡。“滹滹訾訾,亦孔之哀。议论之相和而相背也,无轨于道者。故曰:议论多者,其国必倾。”^{[4]536}他认为宋、明两朝的衰弱、灭亡,与士大夫的群议关系密切。“宋、明两朝之终于衰弱,渐然以尽,诸儒议论之力为多。”^{[6]789}“宋之所以弱也,议论胜也,后世顾艳称之。”^{[4]431}因此,为了避免大清王朝像宋明一样毁于群议之手,郭氏认为,他必须大力宣传自己的主张,使士大夫及时醒悟。“故所在申明其义,欲以晓世人之惑,使不至以虚浮之议论贻误国家。”^{[4]400-401}

二 群议风气的起因

面对来势汹汹、祸国殃民的群议,郭嵩焘自然要思考这股恶劣风气是如何形成的。从现有的史料来看,郭嵩焘将群议风气的起因归结为四点。

1. 源于无识。郭氏认为形成群议风气的一个原因是士大夫的无识。什么是“识”呢?郭嵩焘认为,“识”可以分为两个方面,即“远识”与“深识”。

“处天下事,以识为本。识有二,有大局之远识,有一事之深识。大局之远识,周子之所谓几也;一事之深识无他,明乎理与势而已。”^{[4]506}而“识”的多少,一方面与读书有关。“论天下事以识为主。识力透出人一层,自能剖晰是非得失,不随众附会。故欲脱除流俗气习,以读书广识为本。”^{[4]447}读书可以增长识见。另一方面,识的增加与人的阅历有关。“西夷本末,粤人多能知之,以久习而知其情伪耳。”^{[9]147}

郭嵩焘认为无识是士大夫疯狂群议的原因,他多次批判士大夫们的不学无术。“俗儒不考古,不知今,影响瞽瞍,蒙窃悼之。”^{[9]165}在和战问题上,他认为“京师士大夫不考古,不知今,徒以议论相持,贻误国家而不惜”^{[4]403}。当厘金政策受到士大夫的批判时,他认为士大夫们发出如此责难是因为他们胸无点墨。“儒生不考古,不知今,哆口张目,为商贾献谀,以护惜其锱铢之利,而不知两楚厘税之为法,利安天下,保全农民,救时之急务,抑亦衰世之仁政也。”^{[4]476}

正因为郭氏认为无识是群议癫狂的原因,所以当后来中外交往渐多,士大夫越来越了解洋情的时候,郭氏认为朝内议论日渐平允。“通使各国十五六年,诚无多裨益,而搢绅士大夫纷呶喉呿,渐以醒寤,议论日平。”^{[9]248}“近年见闻日开,人心日平,视初时气象固远矣。”^{[5]24}

2. 源于惯习。一方面郭嵩焘到历史中寻找历史传统,认为这种传统遮蔽了士大夫的目光;另一方面,郭嵩焘还强调共时性因素所起的作用,强调士大夫作为剧中人所处的既定的“舞台背景”——既有的流俗——对士大夫的支配。这两者,作为惯习,是群议风气的另一个起因。

郭嵩焘认为南宋时儒士的议论风气发生了巨大变化。“益见南宋以后之议论,与北宋以前判然为二,然自是成败利钝之迹亦略可睹矣。”^{[9]34}“窃观汉唐名臣,史传所载疏论,皆以谏止征讨为义,从无敢倡言用兵者。南宋之世,假复仇为名,而言始器。”^{[8]409}南宋之后,儒生们空话连篇,只会说些不切实际的虚词浮语。“南宋诸君子及明季议论,如弄空枪于烟雾之中,目为之眩,手为之罢(疲),而终一无所见。”^{[6]858}“宋儒之乐持虚论而不务求实际,有以阶之厉也。铲除此等议论,而后人心风俗可几于古。”^{[6]80}在郭嵩焘看来,晚清士人深中南宋之毒,不能自拔,“徒以眩于南宋以后之议论,不务考古

今事局”。^{[8]401}由于不能突破南宋以来嚣张的群议风气,对外交涉,日益艰难。“而五十年来办理洋务,日趋歧左,正坐一二贤者高视阔论,专习南宋以后嚣张之习。”^{[9]225}因此,郭嵩焘感叹南宋形成的群议传统的危害。“南宋议论之为蔽也深矣。数百年来,卓然有见于安危得失之原,而持根本之论者谁故?”^{[4]431}

除了到历史中寻找解释,郭嵩焘还认为,既有的流俗,也是促成嚣张的群议的原因。“大抵人心随世俗为趋尚,王纲不立,学校不修,此理不明于世,而世俗相沿之议论从风而靡,莫有能辨知其得失者。”^{[7]503}流俗依据片面的见闻议论是非,“流俗据目前之见以议论天下事”,形成一哄之议,“流俗所据为毁誉而一哄无异辞者”。郭嵩焘认为,士人们蔽于流俗,不辩是非,附和人言。“文人以爱憎曲肆毁誉,颠倒是非,道之贼也。锢蔽于流俗之见,而是非曲直,靡然从风,以害理伤教,亦道之贼也。”^{[4]506}因此,他主张君子远流俗。“君子之学,必远乎流俗,而必不可远道。”^{[9]146}

3. 源于求名。郭嵩焘在反思士大夫们的群议时发现,士大夫求名的心态与群议风气的形成有密切关系。为什么士大夫要大谈对外作战呢?郭嵩焘认为这是为了求取声名。他认为南宋士大夫是出于立名的目的才主张北伐的。“南宋争和议之非,人人言之慷慨。其言美矣,要皆一时风尚所趋,鹜于其名而争言之。”^{[4]430}南宋之后的士大夫,也是这样。“自宋以后,议论繁多,徒以博流俗之称誉耳。”^{[11]461}他认为曾纪泽和左宗棠之所以在中法战争前夕极力主战,鼓动舆论,只不过是争名。“劫刚又上中堂书,发八难以推明主战之说,其言足以欲动今时士大夫……劫刚意在规合时人之论,以求一日之名耳。”^{[9]215-216}“左相既欲取还伊犁以为功,又不乐居賈取之名,乃以诤之朝廷,而不复考求之当否、事理之顺逆,方且侈然主战,用其骄溢之气鼓动一时议论,以攘取天下之大名。”^{[9]209}

郭嵩焘的思想并未停留于此,他进一步发现,当具有求名心态的士大夫遭遇群议时,会出现两个有趣的现象。第一,人们会为了声名主动附和群议。“凡有禄于朝者,同声一辞,期以掩蔽天下之耳目,自托于春秋之议。僧邸固习闻士大夫之謬说,姑一诱击夷人,以攘天下之名。……两相比焉,以交务为名。呜乎,务名之甚,而至于无君。”^{[4]506}第二,群议中的士大夫为了争取更高的名声,会竞相

发表极端言论,以致群议本身不断极端化。“而在廷士大夫哆口言战,千百为群。其立言不过至尊朝廷、攘夷狄,以议论相高。”^{[4]402}以议论相高,即是说士大夫在对外问题上,拼命向别人显示自己比别人主战,“以自快其议论而为名高”^{[6]180}。

4. 源于无耻。出使英法前,郭嵩焘并未将群议风气与无耻联系到一起,但是出使欧洲后,郭嵩焘觉得无耻也是群议风气的一个起因。“久居西洋,始知中国人心不能自振发,而专为大言自欺,其源由于无耻。若广东生者,无耻之尤者也。”^{[6]515}光绪六年他指责朝中主战大臣,认为他们很无耻。“京师诸公无知事理者,又方以是仰窥醇邸之意,曲意迎合,贻害国家,其无耻亦已至矣。”^{[7]70}左宗棠也因主战,被他大骂无耻。“奏疏出之左相,绝不筹及天下大局……以战为功,不知其他……欺心昧良,以求欲动天下耳目,谓之无耻可矣。”^{[7]391}出于这种意识,他认为国家一定会被无耻所误。“更涉世故四十年,深悟士大夫之无耻,无往不极其致。其端兆自人心,而其害必中于国家。求免于危乱,难矣。”^{[7]423}

三 言语观与群议观

郭嵩焘对群议的种种重法,与其独特的言语观有内在关联。郭氏认为言语有两层性质:一方面相对于客观事实和表达者的心体,言语有相对独立性;另一方面,言语并不能完全脱离事实,对事物总会有所反映。此外,在郭氏的认识中,言语与德性呈正相关性。

1. 言语的相对独立性。郭氏曾以丁日昌的话为例,来说明言语与事实之间可能会出现差距。“丁禹生言:在江苏惟闻人言,中丞求治太急,以为急于求效而已。泊来粤考求一切措施之宜,无一不搜求底蕴,维持而匡正之。”^{[11]373}旁人口耳相传、言之凿凿的言论,并不一定反映事物的真相。

郭氏还认为作为表达者表达结果的言语,与表达者的主观想法之间,可能会出现较大差距。“天下事存乎任事者一心之运量,宣之于口,已有不能尽详者矣。笔之于书,则更有参差焉。何也?自得者之为言,与以所得示人,不独其离合出入之间不尽符也,亦实有其难言者焉。”^{[4]141}即作为言语的表达者,无论是用口语,还是用文章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其表达结果总是偏离表达目的。更何况,表达者的一些心理表征是根本无法表达的,甚至在某些

条件下,言语能够完全脱离心体。表达者能罔顾良知地颠倒是非,使听言者黑白莫辨。“人之无良,莫甚于二三其德。喜怒无常也,爱憎无定也。倏而之此,倏而之彼。倏而加诸膝,倏而坠诸渊。心思之所极,无从质诸言行。”^{[11]384}

2. 言语能够反映客观事情。虽然郭嵩焘认为言语与客观事物,与表达者的心体,存在偏差,但是言语还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客观事实,反映出言语之表达者的心理状态。“人言之不尽无凭,于兹益信。”^{[11]539}人的言语不完全是空穴来风,总是有所根据的。

郭氏认为言语作为表达者的表达结果,虽然与表达者心中的想法有所差异,但还是能够反映出表达者的一些观点。“求人而求之语言之间,十无一得。然细心察之,亦未尝不可窥见其底蕴。”^{[11]526}随着表达者阅历的日见丰富,识见的逐渐提高,其所发表的言论也会越发精当。“盖凡阅历有得之言,其出之口必亲切有余味,而非其心确有所见,则语虽辩,必不能悉中窾要,一穷诘之,而游移立见。”^{[4]526}“凡理有是非得失,而事有甘苦曲折,所得之浅深不同,而言之以异,明者辨之。”^{[11]15}

3. 言语与德性有密切关系。郭嵩焘常将言语与德性联系起来,认为一个人越有德性,那么其说话就越温文尔雅,所谈也越言之有理。他曾回忆他见一位有德者的情形,“嵩焘少侍先公,见所与游处耆宿长老,敦厚质朴,其言多若讷者,私计先进名德宜如是。稍长,见玉川杨先生,貌和而心夷,气温而词雅,就与之言,曲尽事理之变,如读欧阳氏、曾氏之文,甚详以要,有馀味也。”^{[9]270-271}“云谷观察莅楚二十年,接其貌,温然以肃;聆其言,介然以和。”^{[9]301-302}显然,在郭嵩焘心中,言语与德性是密切相关的。

郭嵩焘认为言语的表达者,应该尽量使言语与内心相一致。他特别赞赏英国外相德尔比的说法。“德尔比述‘法前〔国〕百年前有公使驻英者曰达里兰,常言:‘天生人口使善言,非以宣导其心之隐,乃欲使善隐蔽其心,使人不易测也。’此语颇极调侃。吾则不然,一切使此心宣著于外,惟期口与心相应而已。”郭嵩焘赞同他的说法,称赞德尔比是良臣,“其言如此,无愧良臣矣。”^{[6]205}郭氏为自己的言不达意而懊恼不已。“言辞之钝拙,不能自尽其意;即其稍能自尽者,人亦不能得其意之所向。甚哉,语言之拙之不宜于世也。”^{[6]651}

郭嵩焘对言语的认识与他对群议的看法有密切关系。在我们旁观者看来,正是因为言语可以脱离客观事物,具备相对独立性,才使得群议有可能独立于言语者成为压迫性力量。言语又不能完全脱离客观实际,阅历的增加能够改变人的言论,为郭氏晚年的观点——中外交流使得朝中议论日趋平允——提供了理论前提。郭氏出使泰西后将“拒夷”“主战”归因于无耻的想法,极有可能与他的言语与德性相关的观念有联系。

四 君臣与群议

面对可能祸国殃民的群议,君主与大臣当如何作为,才能抑制群议,并将朝廷内的舆论风向引上正轨;言官是群议的重要参与者,在晚清的群议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朝廷该如何处置言官。郭嵩焘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了论析:

1. 君主与群议。郭嵩焘认为,面对群议,君主应拿出霹雳手段,以诛止乱。“王制,汉以后之书,所称乱政、疑众之四诛不以听。帝王整齐天下之人心,宜有如是者也。胡广、刘歆附莽,以伪倡天下,而颂功德者数十万人。张角、黄巢以乱倡,而从为乱者百万。陈东、欧阳彻以义愤倡,而太学生徒聚者数千人。所倡不同,均之为迷也。”^{[11]14}也就是说,对于像西汉后期士人举进王莽和南宋太学生要求北伐这样声势浩大的群体议论,君主应立即即进行暴力镇压,绝不姑息。

在郭嵩焘看来,君主应以东汉光武帝为榜样,开诚布公,广泛地征求臣下的意见。“北单于求和亲,臧宫、马武上书请诛,光武却之是也,而犹博考廷臣,议酬答之宜。”^{[9]148}对于臣下的各种意见,择善而行,不固执己见。“叔皮所奏,因事裁答,非有出奇之策。以光武之明圣,而取计于一疏远小臣,委己以从之者,良由叔皮之言,处置适中,不激不随,又能直揭匈奴之情,使不能有所隐匿。”只有这样,才能使臣子精忠报国,“抑惟天子以天下之政公之天下,而人能自效其诚也。”^{[4]552}君主只有具备足够的君德,才能真正以天下为公。“秉心宣犹,考慎其相。贤君之治天下,尽于此矣。相之必择,夫人知之,而非秉心以持天下之公,鉴先垢以烛物也,必昏。”^{[4]537}

2. 大臣与群议。在郭嵩焘的认识中,大臣作为朝廷柱石,一方面,不应像言官那样卷入群议之中,应该把精力用到促进君主养成君德上;另一方面,

大臣应当主持政论,防止嚣张的群议出现。

(1)在郭嵩焘心中,大臣应该具有远见卓识,他们不应把精力用到上书论事上去,而应以校正君主的道德过失为使命。“惟大臣为能格君心之非,正不在具一疏、论一事,博直谏之名。”^{[4]358}“三公大臣,当明大义,持大体,启沃圣心,不以奔走治事为能也。”^{[4]358}否则,这样的大臣,只能被称为具臣。“惟大人为能格君心之非,而人不足与适,政不足与间。知此而后可为大臣,不知此者,具臣也。”^{[4]486}

郭氏认为,大臣不应当涉足群议,只有好名的大臣才会卷入群议。“后世大臣所谓贤者,面折廷诤,鹜名者也。”^{[4]486}他大力批判与清流党为伍的李鸿藻和周家楣。“李兰生主张清流,贻害国家,大祸在眉睫间而不知悟,则亦真无如之何矣。”^{[7]414-415}“(周家楣)日行公件,都无端绪,惟日夜倚伏清流,希朝廷意旨,以其间位置所亲信以为爪牙。人知其必误国,专恃所云清流者,劫持朝廷,相与导引,以固其位。”^{[7]434}

(2)除了格君心之非外,大臣还应该主持政论,防止朝中言论极端化。中法战争前,他在致李鸿章的信中表示,希望李鸿章担负起澄清言论的重任。“所以屡渎尊严,诚知中堂所处之难,而群言淆乱,终恃中堂一语折衷。区区愚忱,深望排群议而障狂澜,使天下蒙其荫,利赖无穷。”^{[9]213-214}他觉得清廷中的议论之所以如此嚣张,是因为朝中没有合格的大臣。“而士大夫相与蚩蚩,横生议论。朝无大臣,遂使群口嚣然,莫有能禁遏者,所关殆非浅也。”^{[6]19}郭嵩焘认为,朝中没有合格的大臣,是中国横被夷祸的重要原因,“朝无大臣,群论嚣然,遂以郁成今日之巨祸。”^{[4]471}

3.废言官。郭嵩焘虽然有时会称赞一些言官的呈议,会说一些维护言官的话,但总的看来,郭嵩焘对言官非常反感。郭氏认为,言官导致群议狂乱。“流风相煽以为名高,惟其言之出而无择焉。毛举细故以资其搏击,博采流言以益其泛滥,摺摺天下之利病以臆揣其盈虚,曲徇人心之恩怨以私致其货贿,求有益于国计民生,盖千百而无一也。”^{[11]399}他反对朝廷奖励言路。“直是极意奖藉一二无知者,以招徕其议论。何金寿得此,超迁有日矣。能无慨叹!”^{[6]272}更反对言官干预朝廷重臣的迁调。“轻易大臣以殉言官之狂吠,天下之乱,由是成矣。”^{[7]498}他认为,只有废除言官才可以图治。“历观言路得失,其间贤愚错出。人才勿论也,较其

功过与其利病,敢直断之曰:自宋以来,乱天下者言官也。废言官而后可与言治。”^{[9]183}

五 群议与认知西洋政体

在国内饱受群议攻击的郭嵩焘,带着问题意识去考察西方的政体。他想弄清楚西方是否也有类似于中国的群议,如果西方政论风气比清朝要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1.西方议论风格。在郭嵩焘的意识中,清朝的群议实际上是不辨是非的一哄之议。“世人一哄之议论,无与发其蒙者。”^{[9]192}“流俗之所奔趋,而君子远之。流俗所据为毁誉而一哄无异辞者。”^{[4]506}他尝试着在西方寻找一哄之议的蛛丝马迹。有时郭氏怀疑西方人和中国的一样,也有听信一哄之议的毛病。“摩里邀茶会,晤伯喀兰、德勒色二人。又威洛夫人、兰克里夫人,英国号称美丽者,视之殊不异人。岂一哄之传闻,中外固有同情耶?”^{[6]334}

但总的来说,郭嵩焘认为西方议论风格与中国的不同,西洋的议论允许异议的存在,与万口一词、不容异议的中国群议大相径庭。郭嵩焘在赴英国出任使节的途中注意到英国的朝野舆论并不统一。“《代谟斯》为国政公议,《得令纽斯》则民政议院之旨也,《斯丹得》主守常,《得勒格纳福》主持异论。四者各有所持议,而《代谟斯》为最要。”^{[6]82}西洋议论,允许不同意见的存在,允许讨论。“西洋一切情事,皆著之新报,议论得失,互相驳辨,皆资新报传布。”^{[6]368}

郭嵩焘对清朝士大夫的群议极为反感,称为其“嚣论”“狂议”。当他到英国后,他发现英国政坛的议论风格与清朝的议论风格完全不同。他认为英国的言论直爽。“英国此等持议,一无瞻顾,盖犹有直道之存也。”^{[6]319}他称赞英国议会的议论,觉得它非常公允。“去岁议院曾责印度部总督遣马加理由缅甸历保人境以达云南,系属何意,不能不自任咎。其言多公平如此。”^{[6]290}

2.西方政体与西方议论风格。郭嵩焘从两个方面来解释西方良好议政风格的成因:一是从君德的角度出发,认为良好的君德是西方良好议政风气的原因;二是从政治体制入手,认为两党制是西方议政风气良好的另一原因。

钟叔河认为,郭嵩焘将西方良好的政治风气归因于政治制度,而不是政治人物的个人品质^{[2]129},这是极有见地的。但郭氏并未放弃从君德的角度

来思考西方政论风气。郭氏多次赞美西方君德,认为英国君主比较贤明。“国政一公之臣民,其君不以为私。”^{[6]393}“百余年来,其官民相与讲求国政,白其君行之,蒸蒸日臻于上理。至今君主以贤明称。”^{[9]188}郭嵩焘认为,正是在西方君主的这种公国政于臣民的政策下,平直的议论风气才得以产生。“朝廷又一公其政于臣民,直言极论,无所忌讳。庶人上书,皆与酬答。其风俗之成,酝酿固已深矣。”^{[6]393}

与从君德的角度思考西方政论风气相比,郭氏更多地是从政治体制角度来思考西洋议论风格。起初郭嵩焘并不认同英国的两党制,他觉得这种负气求胜的党争实在无谓。“互相攻击争胜,而视执政者出自何党,则所任事各部二皆用其党人,一切更张。其负气求胜,挈权比势,殆视中国尤甚矣。”^{[6]100}但是当他进一步了解了英国的政治运作情况后,他认为英国政坛平直的议论风气实际上是两党制的结果。“盖军国大事一归议院,随声附和,并为一谈,则弊滋多,故自二百年前即设为朝党,野党,二使各以所见相持争胜,而因剂之以平,其由来亦久矣。”^{[6]389}他对两党制也就变得推崇起来。“西洋议院之有异党相与驳难,以求一是,用意至美。”^{[6]469-470}

在认同英国议会两党制的同时,郭氏表现出对法国议会多党制的反感,认为多党制是法国政论风气嚣张跋扈的原因。郭嵩焘一开始并不知晓法国运行的是多党制。在光绪三年十二月十八与李凤苞的谈话中,他以为法国只有君党与民党两个政党^{[6]393}。后来他发现法国议院内存在多个政党,而且政论风气也非常糟糕。“法国民党、君党狃狃相争,而君党之中,又分为三……民党亦分为三……人心之浮动,又甚于中国之求富贵利达者,亦岂非危道哉。”^{[6]605}郭嵩焘认为,多党制导致了法国政坛言论纷繁。“盖法国分立君、民二党。君党之中又分为三……民党亦分为三……是以议论纷纭,至今迄未有定。”^{[6]752-753}

作为那个时代的绝对少数派,郭嵩焘饱受群议

的攻击。在举世谤议之下,郭嵩焘对士大夫们疯狂的群议进行了深刻的反思。通过反思,他发现在群议中,持论平允的是少数,大多数人言论偏激。而在这种少数与多数的对立中,群议本身变成了压迫性力量。郭氏认为,群议风气有四个起因:无识、惯习、骛名和无耻。郭嵩焘的群议观与其言语观有密切关系。在郭氏的观念中,言语既可以相对独立于客观事实与言说者的心体,又不能完全脱离客观事实与言者的德性,这与他对待群议的看法——群议可以脱离言语者,言说者识见增加时议论会趋于平实——是吻合的。郭嵩焘认为君主对群议应拿出霹雳手段,大臣不应卷入群议,言官当废。出使泰西后,郭氏认为英国的君德是其良好议论风气的原因,两党制可以使政论风气平直,而多党制则会导致议论纷繁。

参考文献:

- [1] 王兴国. 郭嵩焘评传[M].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8:247.
- [2] 钟叔河. 论郭嵩焘[J]. 历史研究, 1984(1):117.
- [3] 汪荣祖. 走向世界的挫折: 郭嵩焘与道咸同光时代[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6:279.
- [4] 郭嵩焘. 郭嵩焘日记: 第1卷[M].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1.
- [5] 郭嵩焘. 玉池老人自叙[M]//《续修四库全书》编委会. 续修四库全书: 五五二·史部·传记类.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5.
- [6] 郭嵩焘. 郭嵩焘日记: 第3卷[M].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2.
- [7] 郭嵩焘. 郭嵩焘日记: 第4卷[M].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3.
- [8] 杨坚. 郭嵩焘奏稿[M]. 长沙: 岳麓书社, 1983.
- [9] 杨坚. 郭嵩焘诗文集[M]. 长沙: 岳麓书社, 1984.
- [10] 郭嵩焘. 郭嵩焘遗札[M]//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研究所. 历史文献: 第15辑.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1:172.
- [11] 郭嵩焘. 郭嵩焘日记: 第2卷[M].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1.

责任编辑: 黄声波